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

全球化、制度建设
和经济增长

〔土耳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著

张军扩 侯永志等◎译 高世楫◎校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
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

[土耳其] 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著

张军扩 侯永志等◎译 高世楫◎校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种经济学, 多种药方: 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 / (土) 罗德里克著; 张军扩, 侯永志等译. --2 版.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3

书名原文: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SBN 978-7-5086-5915-2

I. ①一… II. ①罗… ②张… ③侯… III. ①世界经
济-经济危机-研究-现代 IV. ①F1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2956 号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by Dani Rodrik

Copyright © 200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一种经济学, 多种药方

著 者: [土耳其] 丹尼·罗德里克

译 者: 张军扩 侯永志等

译 校: 高世楫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2 版

京权图字: 01-2008-2367

书 号: ISBN 978-7-5086-5915-2/F · 3599

定 价: 48.00 元

印 张: 16.7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

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钱颖一

2015年7月5日

① Dani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9631, 2003.

在过去 25 年的全球发展经验中，中国的表现十分突出，它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增长加速纪录。正是这一原因，人们对其他贫穷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前景依然能够保持乐观，而不论它们最近的增长纪录是多么令人沮丧。因为既然中国能做到，其他国家理论上也能做到。

因此，中国的故事在本书中占突出地位。在本书中，我不时会提到中国的改革：经济改革需要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分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的方法，而不是开列无所不包的、细目清单式的方法；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做出准确诊断并集中力量加以解决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进行试验和政策创新；以注重实效且常常是非正统的办法克服政治约束和次优解决方案带来的问题；对于那种普适性、最优做法式的“改革药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保留和运用政策手段，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促进多元化。

中国的例子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这些特点在中国都已足够显著；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人们很难想象中国会做得更好。

中国 1978 年之后的经验常常被简单地描绘成经济自由战胜政府监管、市场战胜计划的典型。当然，释放基于市场的激励措施在中国转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标准的诠释忽视了一个核心要点，那就是：中国的政策并非只是大爆炸式的《华盛顿共识》改革的一种渐进的或更加务实的版本，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的结果。根据这种思维模式，人们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措施可行或不可行，因此需要在具体的背景和过程中寻找解决方案，鼓励试验，也不会因为属于非正统而难堪。虽然其他国家不能完全照搬中国的具体改革举措，比如价格双轨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等，但却可以仿效中国的思维模式。

我在书中对经济增长的启动和经济增长的维持做了重要区分。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又提出了两种制度性挑战：一种与保持生产的活力有关；另一种则与加强冲突管理的制度有关。在这两个领域，中国的前途都布满荆棘。

先看生产的活力问题。在发展多元化和不断成熟的加工出口部门方面，中国做得非常成功。保障这一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力的产业政策，从而促进了国家和私人投资者在非传统经济活动中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二是对人民币的低估保障了其在世界市场上的持续盈利能力。但未来中国运用这些政策工具的空间将会大大缩小：诸如补贴或国家支持性的产业政策将会受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身份的限制，而人民币在美欧的压力下也会升值。这里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业是否已经发展到具有自立能力的水平，从而即使离开这些扶持性政策也能不断前进？或者说，中国政府是否需要发展“新的”产业政策方法，就像本书第四章所概述的那样。如果需要，那将是些什么样的政策？

更大的挑战是法律和政治领域的制度性转变。如果中国继续增长，继续缩小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那么它就必须加强其法治和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仅就其自身而言是人们所需要的，它还是管理和处理

各种由内外因素所引起的冲突和动乱的手段，正如我在本书第五章中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在经济竞赛中，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很多；但中国再往前走却面临严峻的制度性挑战。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最终会增长到其脆弱的制度基础之外，从而使得增长出现停滞？或者说，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的领导人能否做出与经济发展方面同样成功和具有创新性的试验？

丹尼·罗德里克
2008年5月21日

“比较译丛”序 V

中文版序言 VII

导 言 001

第一篇 经济增长

第一章 对全球 50 年经济增长格局的一种诠释 / 013

第二章 增长诊断法 / 051

第三章 制定增长战略的实用方法 / 080

第二篇 制 度

第四章 21 世纪的产业政策 / 093

第五章 高质量增长的制度基础 / 139

第六章 选择合适的制度 / 167

第三篇 全球化

第七章 治理经济全球化 / 179

第八章 从发展的视角看全球贸易治理 / 197

第九章 谁的全球化 / 220

注 释 / 226

参考文献 / 238

致 谢 / 251

译后记 / 255

附 录 / 257

几年前在访问一个拉美小国期间，我和我的同事对该国的财政部长进行了一次礼节性拜访。财政部长准备了一份关于该国经济最新进展的详细的 PPT 演示稿，他的助手通过投影仪向我们一一展示。这份演示稿列出了他们已经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贸易壁垒已经清除、价格控制已经取消、所有国有企业都已私有化；财政政策收紧、公共债务减少、通货膨胀也不复存在；劳动力市场富有弹性、外汇和资本没有管制、经济向各类外国投资开放。“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第一代改革和第二代改革，现在正在进行第三代改革”，他自豪地说。

的确，这个国家及其财政部长是那些源自国际金融机构及北美学术界关于发展政策的教条的优等生。照此逻辑，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可言，那么这个国家就应当得到高增长和减贫的奖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国经济鲜有增长，私人投资仍然萧条，因而，贫

困和不平等不降反升。那么它究竟错在哪里了呢？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经济体——主要但不全在亚洲——其经济发展速度比最乐观的经济学家所能预计的还要快。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令人难以置信，印度的表现虽然算不上明星，但却足以使那些曾经认为这个国家经济增长永远不会超越 3% 的人感到迷惑。显然，全球化对那些懂得收获它的人给予了巨大的奖赏。那么这些国家又都做对了什么呢？

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

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迷惑的经济问题，也是本书各章将要展开讨论的问题。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讲，回答这些问题既有趣又富有挑战性。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答这些问题，将决定这个世界上的穷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赤贫中解脱出来，改善生活水平，获得较好的健康和教育，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运。经济增长是最有力的减贫工具。如果你看一下今天的世界地图，你知道哪些地区贫困最为严重吗？最简单的回答就是：那些自 18 世纪中叶现代经济增长开始起步以来增长最少的地区。即使在较短的时期内，经济增长也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自 1980 年以来的快速增长已经使超过 4 亿人口脱贫^①。当然，增长也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存在一些地区，虽然保持了 10 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但其国民健康和其他社会指标却并无明显改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事情比经济增长更能使一个社会有能力改善其成员的生活状况，包括最底层成员的状况。

一些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停滞之后踏上了高增长的航程；另一些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之后反而濒临崩溃；还有一些国家则从来就没有经历过持续的增长。本书试图对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增长方面的成败做出解释，并从中汲取教训。我的目标是既能解释过去，又能为今后的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在本书中我将力图阐明那些最能支持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安排——包括国内的和全球性的。

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经历都发生在同一个经济快速全球化的时

代，各国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对外部影响所做出的反应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国内政策选择成为决定增长成败的最终因素。成功的国家就是那些能够利用全球化力量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国家。如果不能进入发达国家相对开放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中国和印度就不可能做得那么好。然而这两个国家的成功也要归功于它们各自的政府在重构经济和实现多元化方面协调一致的努力。如果中国和印度除了服装和农产品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供出口，那么其从外贸和外资得到的收益也就不可能那么大。因此，要解释过去，启示未来，就必须理解全球化与国内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这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反思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不再是提出“各国在全球化时代必须做什么？”的问题，而是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应当如何设计才能最大限度地支持各国的发展目标？”的问题。本书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讨论后一个问题。

本书所涉及的议题是增长、制度及全球化，虽然比较宽泛，但我认为它们出现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而这个框架又是基于一些共同的偏好（predilections）或成见（preoccupations）。因此，首先对于这些偏好——有些人会称之为偏见——做出说明将是有益的。

各式各样的信条

第一，本书严格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下述方法论上的认识倾向：理解社会现象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其视为诸多个体的有目的行为的集合，他们作为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政治家等相互作用，并受其所处环境的制约。我发现这不仅是组织我们有关经济事务的思想的最有力的准则，也是我们思考经济事务的唯一合理的途径。如果我不时地偏离“主流”经济学家在发展政策方面已经形成的共识，那么很少是因为在分析方法上有什么不同，更多是因为所读到的证据有所不同，或者是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评估有所不同。研究生在学术讨论室里所学到的经济学根据分析者所做的具体假设的不同，不仅很抽象，并且充满各类市场失灵，

几乎留下了无限的政策选择空间。正如我在本书中将要论述的，许多经济学家根据简单的经验法则提供咨询而全然不顾经济社会背景的做法（私有化这个、自由化那个），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的正确应用，而是对这些原理的肆意糟践。

第二，我相信经验证据的重要性。特别是我们的经济政策处方需要建立在对最近经验的透彻理解的基础上。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值得强调的小事，但令人惊异的是它却常常被忽视。政策顾问们常常在没有准确把握一国最近经济形势，即在没有理解该国经济增长过程本质的情况下为该国的推荐增长战略。经济计量学家还在努力寻找 25 年前拉美国家及其他地区怀着极大热情实施的经济政策对于促进增长的效果。我并不是一个只追求相关证据的纯粹主义者。尤其是，我认为进行国家之间的回归分析和对单个国家的深入研究都有必要。任何没有得到案例研究证实的由跨国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都值得怀疑。任何出自案例研究而与跨国回归分析结果相矛盾的政策结论也需要仔细审查。最终，为了把握现实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就需要来自这两方面的证据。

第三，我坚信政府有能力做好事并改进其社会状况。除了保障市场正常发挥作用外，政府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这个看法与另外两种观点是对立的。一种是公共选择或寻租理论的观点，把政府视为私人利益的邪恶工具。当政府实施干预时，它只是为了保护其支持者、亲朋好友或官僚自身的利益。根据这个观点，对政府行为的限制越多越好。另一种是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它对政府作用的好坏并不做事前判断，但却把政府行为完全内生化的，认为一切都是由一些长期的结构因素所决定的，从而几乎没有给政府发挥作用（无论好坏）留下什么空间。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政府应当做什么？”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至少是他们难以回答的。上述两个学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认为他们都低估了运气和不完备知识在政策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公共政策的世界里，便道上遗撒了许多百元钞票，经济学家的作用就是指出它们，而政治领袖的作用，则是设计出交易条件使那些百元钞票被捡起来。

第四，我相信恰当的增长政策几乎总是因地制宜的。这并非因为经济学在不同的条件下作用不同，而是因为家庭、企业、投资者所处的环境以及由此所提供的机会和约束有所不同。“你不理解，这项改革在我们这儿行不通，因为我们的企业家对价格激励没有反应。”这不是一个有效的论点。“你不理解，这项改革在我们这儿行不通，因为信用约束妨碍了我们的企业家利用盈利的机会。”或者“因为企业家被课以重税。”这就是一个有效的论点——假设借贷困难和重税都有据可查。向他国学习总是有益的——的确，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对政策实施的背景以及导致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没有充分了解而直接照搬（或拒绝），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一旦了解了背景，总会对原来的政策做适当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往往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五，执着于在严格的约束条件下确定改革的轻重缓急、先后次序、选择性和目标专注性的成见。经济学家在职业上的问题之一，就是几乎只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看待经济问题。贸易专家会认为妨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缺乏贸易开放。金融专家会认定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和缺乏金融深度是主要问题；宏观经济专家会担心财政赤字、债务水平和通货膨胀；政治经济专家会指责产权或其他制度方面的弱点；劳动经济学家则会指出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然后他们各自都会提出一套旨在消除上述认定缺陷的制度或治理方面的改革建议。比如，贸易的开放不仅要求消除进口关税和配额，还需要改进治理、减少腐败、提高教育水平，以及运转良好的劳动和信贷市场；金融深化要求谨慎的监管、开放的资本账户以及恰当的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稳定需要财政规则、中央银行独立性、遵守国际金融准则，以及各式各样的“结构性改革”。政策顾问们往往很少问这些问题是否真正构成增长的制约因素，所提出的长长的制度改革清单是否针对了一国经济的当前需求。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却受到其所拥有的资源限度的约束，包括资金、行政、人力、政治的资源等。它们必须选择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其政治资本应当用于何种改革。它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份不分主次的细目清单，而是一份基于当地实际、明确了政策优先次序的解决方案。

第六，谦逊。经济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对于政策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但可悲的是，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所取得的实际成就。温斯顿·丘吉尔曾经针对他的竞选对手和继任者、1945年担任英国首相的克莱门特·艾德礼说过一句俏皮话，说他是“一个谦逊的人，有许多需要谦逊之处”。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给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是自大一族，而又没什么可以自大之处。我希望读者会认同本书有所不同，因为它是在一种谦卑的精神下写成的。经济学家既无物理学家那样的充分解释我们周围现象的能力，也无医疗专家那样在我们生病时开出有效药方的本事。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的缺点有自知之明，我们将会变得更加有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始终强调实用主义、实验法则及当地知识。

本书的框架

本书分为三篇：增长、制度和全球化。每篇包含两个独立的章和一个较短的综述。这些文章是在过去大约6年中的不同时间写成的。除第四章外，其他各章均已发表过。我将它们从我已发表的著作中选出，并非因为它们是最喜欢的，或者是更出名的，而是因为它们的主题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准备将它们收录到本书时，我只做了一些小的数据更新和编辑方面的修改，主要是为了使各章之间的过渡更加顺畅，并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

第一篇集中讨论经济增长：为什么一些经济体比另一些经济体增长得更快，当我们设计未来增长战略时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什么？第一章全面回顾增长的实践，并提出两个关键论点。第一，新古典经济分析所具有的灵活性远比起其政策领域的实践者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特别是，第一等级的经济学原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恰当的激励、坚挺的货币，等等——并非只是唯一一个独特的政策组合。在将这些原理进行打包组合、设计成为能够对当地实际情况（所具有的机会和所面临的制约）做出灵敏反应的制度安排时，改革者具有相当大的创新空间。成功的国家正是那些恰当运用了这一空间的国家。第二，启动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码事。前

者一般只需要一些有限的（常常是打破常规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对一国经济的制度能力并无过高要求（参见第二章的讨论）。而后一个挑战在许多方面都要困难得多，因为这要求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以赋予经济抗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并保持生产的活力（参见第四章和第五章）。忽视这两种任务之间的区别，将会使改革者肩负过于雄心勃勃的、无差别的和不现实的政策议程。

第二章（与 Ricardo Hausmann、Andres Velasco 合写）集中讨论经济增长的启动问题。它提出了一个识别对增长“硬约束”的分析框架，以便使改革战略能够集中于那些最紧要的领域。这个诊断法围绕一棵“决策树”展开。从树图的最上端开始，增长可能会受到社会回报不足（inadequate social returns）的抑制，或受到社会回报与私人回报之间差距过大（缺乏回报的私人独占性）的抑制，或受到金融服务不足的抑制。经济系统在遭受上述不同因素的抑制时，会释放出不同的信号。例如，一个金融抑制型经济会具有较高的实际利率，较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投资高度依赖于外部的资金流入（比如汇款）。诊断分析首先是试图找出上述哪个领域构成了对增长的最大制约，然后进入决策树的下一个层级。比如，如果社会回报过低被诊断为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导致社会回报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区位不好，人力资源水平不高，还是基础设施不足？分析继续以分形（fractal）的方式向更加细微的层级延伸，直到找到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从而便于采取政策加以改变。本章讨论了将这一方法运用于三个拉美国家的情况，它们是萨尔瓦多、巴西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第三章是一个较短的综述，总括了前两章所讨论的关键问题，并铺陈了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以便于制定增长战略。它强调了形成增长战略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按此前一章所讨论的方法进行增长诊断分析。第二个步骤是政策设计，目的是以适合当地情况、有针对性和想象力的政策来消除所诊断出的抑制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第三个步骤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要求制度化诊断和政策设计活动，目的是加强经济的制度基础结构，保持生产活力。